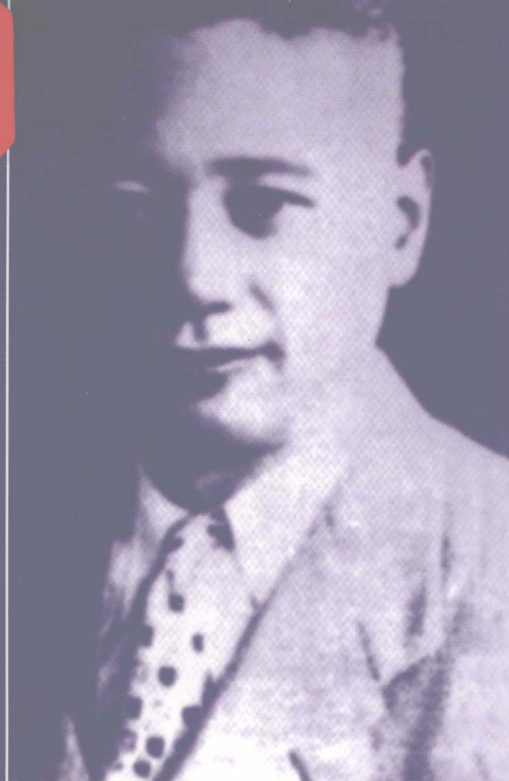


Selected Works of H.D. Fong



方显廷文集 1

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IN CHINA
 TIENTSIN CARPET INDUSTRY
 RAYON AND COTTON WEAVING IN TIENTSIN
 HOSIERY KNITTING IN TIENTSIN
 R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GRAIN TRADE AND MILLING IN TIENTSIN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TIENTSIN
 EXTENT AND EFF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TOWARD ECONOMIC CONTROL IN CHINA
 ECONOMIC STATISTICS IN CHINA
 CHINA'S FACTORY ACT AND
 THE COTTON INDUSTRY
 CHINA'S SILK REELING INDUSTRY
 CO-OPERATIVE MARKETING OF
 COTTON IN HOPEI PROVINCE
 INDUSTRY ORGANIZATION IN CHINA
 WAR-TIM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BIBLIOGRAPHY
 ON THE LAND PROBLEMS OF CHINA
 RU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EKIANG
 INDUSTRIAL CAPITAL IN CHINA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RURAL INDUSTRY
 IN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FOR CHINA'S
 SOUTHWEST
 THE DESTRUCTION OF CHINA'S INDUSTRY
 AND WAYS OF ITS REHABILITATION
 TAIWAN'S INDUSTRIALIZ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CIES AND CONTROL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XPORTS
 IN THE ECAFE REGION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SMALL INDUSTRY IN SINGAPORE
 WAR-TIM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1949-1953
 WHAT CHINA SHOULD KNOW
 ABOUT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SHOEMAKING IN A NORTH CHINA PORT

商務印書館

方显廷文集

第 1 卷

方显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1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显廷文集. 第1卷, 中国之棉纺织业/方显廷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7650-0

I. ①方… II. ①方… III. ①方显廷—文集 ②棉纺织—
纺织工业—中国—文集 IV. ①C53 ②F426.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723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方显廷文集

第1卷

方显廷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650-0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4 插页 22

定价: 99.00 元

总 序

厉以宁

我是1951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1951年我进入北大到2008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58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2006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年他94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年他3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1910年他7岁时,父亲病故,

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那年(1917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年,方显廷先生18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第二年(1929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1931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

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①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

^① 参看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135页。

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①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②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

①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第71页。

② 同上。

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①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②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六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③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于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

① 参看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第138—139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同上。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 1939 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 1941 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 1936 年 2 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① 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 1936 年 2 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②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 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

^① 参看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09—119 页。

^②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11 页。

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1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内,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之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导”。^①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

①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5页。

及远东经济季刊》(这是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刊物,创刊于1950年)上,发表了方显廷先生撰写的《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引起了国外经济界的注意。方显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他用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文章中写道:“生产的恢复受益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①文章还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②

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出版了。这里记录下方显廷先生一生的主要论著。国内人士尽管过去对方显廷先生的学术贡献了解得不多,但我深信,历史是公平的、公正的,只要认真阅读了《方显廷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著述,就一定会了解方显廷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他的治学方法、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2009年6月2日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① 方显廷:《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引言”,载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1953年11月;另见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第286页。

②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第286页。

本卷序言

熊性美

一

我不是为《方显廷文集》写序的最合宜人选。第一，同方显廷先生没有过个人接触，没有当过他的同事、助手或学生；第二，也没有，尽管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所长期工作，系统研读过方氏的著作。但毕竟已在南开经济学系、所留驻了六十年，接触过不少方先生的同事、学友和学生，聆听过不少方氏其人其事，感受到其留下来的（尽管日渐式微）影响，因此，承商务印书馆之邀，以一个南开学人的身份勉力应承为《方显廷文集》写一个序，也算是当前条件下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吧。

方显廷博士 1928 年由美国学成回国，谢绝了孔祥熙提供给他的高薪仕途机会，应何廉之邀，到天津南开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做出了我毕生事业的抉择——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而不是在政府和商业圈子里消磨今生。”在方氏的另一段独白中说得具体：“在我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七年归来之后，给我一个机会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我能最后证

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5页)应该说,这种充满豪情的报国理想的中国留学生的自白,在上一世纪抗日战争前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中并不鲜见,但方显廷是在南开大学用他的具体方式去一步一步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和报国理想的。

什么是方显廷实现其人生价值和报国理想的具体方式?乍一看,很一般;应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开授经济学课程,从事天津地区工业和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但是,如果你深入考察方显廷1928—1938年即抗日战争前短短十年间的工作轨迹就不难发现,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何廉教授合作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和出版工作,包括编制出版南开物价指数,成绩斐然,使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概括说来,由何廉和方显廷共同谋划推动,主要由方显廷具体执行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出版工作,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在当时中国高校和有限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可谓独树一帜,即明确提出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方显廷回忆录》第78页)。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从事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要性,把了解实际情况、获取并整理统计资料以供经济分析提高到原则高度。方显廷写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愿望是,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与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方显廷回忆录》第79页)第三,充分利用南开经济研究所内外的学术资源,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专长,鼓励他们参加有关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第四,讲求研究成果的效益,为求扩大其社会影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研报告多以中英两种文本公开发

表,研究成果利用各种形式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重点学术论文有计划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投送国际学术刊物及知名图书馆收存,等等。

在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工作所体现的上述特点,在本文集的有关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

对于“五四”以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学术界,陈寅恪教授曾表达了关于“吾国学术界之现状及清华[大学]之职责”的看法,认为以求本国学术独立为大学职责所在。考察全国学术现状……社会科学领域,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状况,非乞灵于外人的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究讨论之资。(转引自吾民:“拿什么拯救经济,我的中国”《南方周末》2009年4月23日第30版“自由谈”)

从20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和方显廷诸教授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来看,就是打算脚踏实地对中国经济包括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农业、商业以及物价等做实际调查。这在当时相当荒芜的经济管理学术园地中无异于几株幼苗植株,但为实际经济市场所需要,理所当然地引起普遍关注,而何廉、方显廷等人更以学术调研产品向海外沟通,适应了当时东西方经贸扩展以及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的需要,因而在短时间内扩大了影响。

棉纺织业,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也是中国现代产业中最重要的工厂工业。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中国棉纺织业的专著,包括欧美及日本人士的著述,屈指可数。据我们见到的资料,除了方显廷的几

辑相互补充的专题论文与书刊外,主要是冯次行的《中国棉业论》(上海:北新书局,民国十八年);刘大钧的《中国棉纺织业》,同年在上海以英文出版(King, S. T. & Lieu, D. K.: *China's Cotton Industry, a Statistical Study of Ownership of Capital, Output and Labor Conditions*, Shanghai, 1929);〔日本〕井村董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周培阡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英人 Jamieson, James William: *Report on the Cotton Mills of China*,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905;以及常被方氏在专论中引用的 Pearse Arno S.: *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 Being the Report of the Journey to Japan and China*, Feb-April, 1929, Manchester, 1929。读者只要把这些书刊的内容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以方显廷所著《中国之棉纺织业》一书的内容最为充实,调查最为详尽。

本文集第1卷收辑了作者的代表作《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这是一部对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工业部门之一,从历史到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作了前瞻性分析的学术著作,也是一份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凸显南开经济研究工作当时的一个特色;宏论巨帙,强调从基础调查研究开始做起。

本书由作者本人作序,虽简明扼要,却首先说明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强调“实地调查”并从天津地区开始:关于中国工业化之论著,时有刊行,固多言之凿凿,但多凭理解,殊缺事实上之根据,南开有鉴于此,乃于民国十八年,着手实地调查。天津为华北主要工商业中心,又为南开之所在地,故为便利计,调查工作,即始于此。

其次,作者着重说明本书研究的范围不仅限于天津而是中国之棉纺织业,原因有二:第一,棉纺织工业分布之区域较为集中,不

若手工业之随处可见。天津在华北虽为棉纺织工业比较发达之处,而斯业重心实在上海。是以调查天津之棉纺织工业而忽视上海及其他纺织业中心,则所获结果,难免挂漏。第二,棉纺织工业为目前之最大工厂工业,而论及斯业专书,坊间尚鲜。试观本书后列各种参考资料,即可见其非失之过简,即患过于专门。综此二因,南开决意扩充调查范围及于全国,募集调查结果,成一较为系统的《中国棉纺织业及棉纺织品贸易》报告。

《中国之棉纺织业》全书充实,包括正文、参考书、附录等部分。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历史及其区域之分布;第二章:中国棉花之生产及贸易;第三章:中国棉纺织品之制造与销售;第四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其后续部分为:第五章:中国棉纺织业之组织;第六章:中国之手工棉织业;第七章:中国棉纺织品之进出口贸易;第八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读者从本书的目录即可大略断定这是一部以中国棉纺织业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包括棉纺织品的生产经营运销之分析的学术著作。翻开本书读者不难看到,作者编制及采集的统计表格多达 120 个,自行编绘的统计图表 39 个,由此就能知道这本学术专著实际上也是一份中国棉纺织业的调查分析报告。作者用辛勤劳动兑现了他自己说过的愿望:“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方显廷回忆录》,第 79 页)

不仅如此,方氏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数字更体现了经济分析的质量。因篇幅所限,我们只能举几个例证。

第一章简述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历史及该产业 20 世纪前期的地区分布情况。本章篇幅不大,却明确指出 20 世纪初以来该产业的许多工厂逐步集中于江苏省的上海、无锡、通崇海(即南通地区),

山东的青岛,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天津等六处,而上海尤为重要,堪称中国棉纺织业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论著提到过中国的棉业聚集在中国沿海城市,但是为什么如此集中于上述六个城市?这是个生产布局问题,却鲜有明确的回答。方氏在这里给出了系统的解释。

作者提出四个主要原因。第一,这六个市都处在中国棉花产地中心,无虞棉纺原料供应的短缺。第二,生产经营享有机动力即煤和电力供应的便利。第三,是棉纺织原料、设备及产品之运输的通畅。这六处棉业中心,除了通崇海偏处江苏省一隅外,都是当时主要铁路干线必经之地;像上海、武汉、青岛还是重要铁路线的始发和到达站。第四,这六个市乃是临近广大地区的市场和金融贸易中心,如江苏、山东、河北、湖北四省仅占全国面积的5.5%,而人口却占到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6%,密度甚大。上海、天津、青岛、汉口都是我国开埠较早的通商口岸,六大城市均设有大银行、交易所、保险公司等,专营棉花、纱布贸易的殷实商号亦复不少,人口密度和市场供求的互动影响,促进了中国工厂棉纺织业的地域集中趋势。

概言之,方氏结合中国棉纺织业史的考察,尤其是20世纪以来对工厂棉纺织业的缜密调查及其与市场互动的经济分析,首先回答了棉纺织业集中在六大城市的原因与特点。我认为这是这本学术著作的第一个质量亮点。

再看第三章中国棉纺织品之制造及销售中关于纱厂效率一节。在一般经济学研究中,如何计算及分析有关效率问题,应该说常是一个难点。在本节,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在不发达的生产环境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去选择搜集可利用的调查统计资料,其次,是如何确定计算工厂效率的合理方法,质言之,中国“许